

# 改革要使生产生活便利化

●金鼎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必须更多依靠改革红利推动经济发展。那么，什么是改革红利？如何衡量改革红利？改革怎样释放经济活力和完善创新驱动机制？这些问题也许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命题：改革能使我们生产和生活变得更便利吗？

改革红利是因制度变革而由经济主体所创造的活力增量。创造改革红利，实际上就是通过制度变革使新制度下的经济主体能够具有更高的行为效率和创造力，从而以更大的创新活力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回顾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那么不便：择业不便、生产不便、交通不便、购物不便、迁移不便、出行不便、出国不便等，整个社会处于被“计划”严格限制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突出表现就是各方面的“松绑”。择业、生产、交通、购物、迁移、出行、出国等都有了很大自由度和便利性。一句话，经济“活了”。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因此不断释放出来，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这就是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红利的显著表现。

改革的成就使我们更加相信市场经济的制度逻辑：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应是能够保证微观经济主体更便利地行使自主权的体制。简而言之，市场经济是最具经济便利性的制度。而经济便利性可以定义为：微观经济主体行使自主选择权的制度有效性和无障碍性。微观经

济主体行使自主选择权的成本越低，表明体制的经济便利性越高；反之，微观经济主体行使自主选择权的成本越高，则表明体制的经济便利性越低。显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达到经济便利性更高的目标。而改革红利实际上就是因经济便利性提高而增强市场经济活力，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可见，经济便利性的增强是产生改革红利的基础和根由。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便利性的显著提高是所有人都切身感受到的事实。但我国的改革尚未完成，各领域的经济便利性仍然不足。体制性障碍的存在、思维定势的束缚，导致潜在经济活力远没有充分释放出来。特别是由于体制机制运行不顺畅、不便利，必然发生以各种腐败方式来“润滑”的现象，形成权钱交易空间。现实表明，腐败行为通常发生在缺乏经济便利性的制度环节，特别是如果权力可以不受制约地剥夺经济便利性，腐败行为就会大行其道。经济便利性越低，腐败现象就越严重。而一些人的腐败行为又会导致更多人处于更加不便利的境地，从而诱发更多腐败。同时利益固化的藩篱损害大多数微观经济主体的便利性，也会产生腐败现象。可见，腐败是经济便利性的反向力量，腐败与不便利性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恶性“循环累积”效应，相互强化。因此，增强经济便利性的改革就是对腐

败行为釜底抽薪；反过来，消除腐败也有助于提高经济便利性。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容许绝对自由。即使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必然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划定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边界。实际上，只有在一定的制度秩序下，才可能实现和保持经济便利性。因此，需要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规制，在改革中必须对经济便利性与规制有效性进行权衡。那么，改革的方向是更倾向于监管便利性，以提高规制有效性，还是更倾向于经济便利性，以提高经济活动自由度？这取决于对改革效果合意性的共识。

如果我们的共识是相信市场经济基本逻辑的有效性，那么就可以认定，监管便利性归根结底应有助于经济便利性。经济便利性是改革红利的试金石：凡经济便利性增强之处，制度性摩擦减少，交易成本降低，创新层出不穷，就会产生改革红利；反之，在损害经济便利性之处，制度摩擦增加，交易成本提高，创新活动受限，就无法产生改革红利。总之，最大限度地保证微观经济主体有序从事有益活动的便利性，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经济活力；最大限度净化制度环境，就最有助于形成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如果制度变革向更具经济便利性的方向演进，那么，改革就是走在创造和释放红利的道路上。

## 多措并举构筑“老有所养”保障网

●胡宇齐

养老矛盾凸显，是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社会现状的一个缩影。当下，中国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而人口红利等低成本优势却在不断递减，资源、时空等限制性因素日益收紧，“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成为突出特点。养老问题既反映出时代的整体困境，也牵扯到特殊的个体差异，需要衡量各方利益进行破解。

河南省平顶山市康乐园老年公寓火灾造成38人死亡，令国人心痛，也再次触动了公众对于养老问题的焦虑。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我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仅26张，远低于50张的国际标准。而在有限的资源当中，分布不均、条件不好等现实，使得少数优质养老服务更显珍贵，这在大中城市尤为突出。

最美桑榆景，人间重晚晴。老年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安享晚年是大家最朴素的期待。养老问题，不只是一家一户的事情，也关乎整个社会的伦理观念和价值标准；不仅影响人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也关乎整个社会的安稳与发展。当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银发浪潮”正朝着中国社会滚滚而来，而国人对养老水平的要求普遍提高，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吃好穿暖、病有所医，也延展到精神层面的“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老有所为”，破解养老问题的困难程度正明显加剧。

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依然占据着国人的主流地位，但新旧切换的大背景下，“四二一”家庭结构取代了以往的大家族模式，催生出“倒金字塔”的养老困境；地区发展、城乡发展不均，每个家庭的养老需求和现实困难千差万别，而社会养老机构要么能力不足，要么价格高昂。

老年生活是在家中度过，还是住进养老院？这是每位老人的“心病”，政策设计必须纳入考虑。调查显示，选择家庭养老的老年人，英国为95.5%，美国为96.3%，日

本为98.6%，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家庭养老仍占绝大部分。中国素来在家庭养老上具有独特优势，一位联合国官员曾表示，“以中国为代表的家庭养老的亚洲方式，是全世界解决老年问题的榜样。”但也要看到，在今日的中国，完全依靠家庭养老已不现实，在继续发扬传统优势、发挥家庭作用的同时，多措并举、多方给力推进社会化养老也是重要补充。在这方面，政府既要积极调动各方力量投入养老产业，也要警惕资本逐利性对养老公益性的冲击，为全社会做好兜底工作。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会改变。类似养老这样亟待破解又棘手异常的问题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甚至各项问题间还会“剪不断、理还乱”般缠绕纠结。比如教育，如何让有限的优质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分配，彰显公平？比如医疗，如何让每位公民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维护生命尊严？比如住房，如何让大城市的“住有所居”不再成本高昂，基本的生存需求不要压垮梦想？这些问题，都再真实不过地存在于每位公民的生活之中，彼此关联、环环相扣，构成了我们迈向现代化这宏大叙事中的必过之坎。我们既要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靠进一步发​​展来逐步解决难题，同时也要急民之所需，下气力解决现时突出问题，让当下的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在老龄化社会中实现老有所养，达到理想安心的状态，还需要诸多现实的努力。安置好百姓的夕阳生活，需要把杂乱的线头一根根捋顺，把穿针走线的思路一步步清晰，行动起来才会更少些折腾。破解养老问题，积极回应百姓的民生诉求，在化解矛盾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探索方法，为其他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提供思路，由此及彼，积铁寸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才会更早实现。

●刘思

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才能有效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团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主体，集中地代表了我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共同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团结一致，克服任何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通过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有利于增强我们党员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正确立场、头脑清醒。目前，一些国际反动组织妄图分裂我国，西方资本主义也试图用和平演变等方式同化我国，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员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我们党的执政之基，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党立国的根本，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国以贤兴，政以才治，为政之要在乎用人。中央决定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主要是着力解决领导干部如何做人做事的问题。

做人与做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一个什么样的官，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古代圣贤对此有深刻洞见，所谓“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先修身而后求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方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都揭示了做人与做官的内在联系。好人不一定是好官，但好官必须首先是好人。做人是做官的前提，做人是篇文章，如何修身做人是每一位领导干部要认真思考并躬身实践的大课题。

做一个有德之人。古人云：“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德乃立身之本，道德品行是衡量领导干部做人从政的首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领导干部的道德操守和品行修养绝不是个人小事，而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大事。当前，一些领导干部信念动摇、诚信缺失、品行不端、趣味低俗，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违法乱纪、腐化堕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立德上缺乏自觉。为此，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好领导干部如何立德的问题。“德”，就是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诚。修身立德关键是要经常反省反思，常思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做一个为民务实清廉的官。

做一个守道之人。世间万物，皆有其道，做人处事，也要守道。这里的“道”是指人生信条、社会规范、行为准则。守道是一种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人格体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墓志铭上刻着这样一句话：有两样东西，越是深入持久地思考，就越能唤起心灵的赞叹和敬畏，这就是我们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心中有敬畏是一个人守道的起点。古人云：“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心敬敬畏，做人就不会出格，做事就不会为所欲为，做官就不会让权力任性。做一个守道之人，就要安贫乐道、立身行道，把好欲望关，增强免疫力，坚守做人做事的底线，不该拿的东西不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办的事情不办，以规矩立言立行，凡事按制度和规定办，用权于法有据，始终在正道上稳步前行。

做一个有为之人。一个人有梦想、有追求、有奋斗，人生才会有意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领导干部不在官位高低，而在于是否有益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人民的公仆，就要多一份责任，多一份辛劳，多一份担当，要有“心里装着老百姓，唯独没有自己”的公仆情怀，心系群众、为民造福。“为官避事平生耻”，作为领导干部就要有担当精神、奉献精神。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只有始终牢记使命，认真履行职责，在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主动作为、奋发有为，以实际行动创造无愧于时代的实绩，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抒写无怨无悔的人生。

“三严三实”是修身做人的基本遵循，是为官做事的行为准则。作为治国理政主体中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时刻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谦逊态度，聚焦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把“三严三实”作为一面镜子、一把尺子，经常照一照自己的思想，量一量自己的行为，以加强修养为来提升作为，在实践中把做人与做官统一起来，始终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坦坦荡荡做官、干干净净做事，引领社会形成良好风尚。

有不断改革创新，汲取一切先进科学的精神营养并充实到自己的民族精神宝库之中，推动民族精神的发展，才能生生不息，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积累和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它包括与时俱进的意识和精神，开拓进取的意识和精神，求真务实的意识和精神，讲求效益的意识和精神，奋勇争先的意识和精神。中国人民就是依靠这种精神，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经受了各种严峻考验，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开辟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发展最好最快的历史新时代。时代精神反映一个时代基本特征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追求，同时也是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影响着时代进步的方向和潮流。

第四，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其他社会成员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认同。党员必须带头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自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指导主观世界的改造，加强个人思想品德修养，带头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要求我们党员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道德问题是做人的首要的基本问题。古人说：“百行以德为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道德问题上，党员干部无疑应该比普通群众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许多腐败分子走上犯罪道路，大多是从操守不严、品行不端、道德败坏开始的。因此，党员干部必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生活情趣，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浩然正气，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影响群众，在各自工作岗位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 让智慧城市建设成为城镇化新亮点

●单志广

智慧城市建设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的智慧化，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与城市转型发展深度融合的产物。就具体内涵而言，智慧城市是以推进实体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相融合、构建城市智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充分运用、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最大限度地开发、整合、共享和利用各类城市信息资源为核心；以为居民、企业和社会提供及时、互动、高效、智能的信息服务为手段；以促进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为宗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建设智慧城市既是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提升城市承载能力、促进经济提质增效、提高市民生活品质的现实需要，也是积极引导经济新常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战略抉择。

建设智慧城市有利于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我国建设智慧城市，根本上是要服务于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服务于促进解决“三个亿人”的综合承载问题，即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智慧城市，构建城市统一的地理空间框架和时空信息平台，有利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统筹推进城市规划、国土利用、城市管理、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等的数字化和精准化，在能源、交通、环境、通信、防灾、给排水和公共安全等方面有效提升城市运行管理的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以此为基础，可以增强城市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实现城市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舒适、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对于解决“三个亿人”的综合承载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智慧城市有利于促进城市产业经济提质增效、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当前，我国城市的产业发展模式正在从以加工制造业为主体向以现代服务产业、新兴产业、智能产业为主体转型。建设智慧城市，将加速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经济发展各领域的深度应用，大幅促进城市信息资源的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协作开发和高效化利用。这无疑有利于优化社会生产组织协作模式和区域生产力布局，促进城市生产组织方式集约和创新，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增强城市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促进城市经济提质增效和优化升级。据世界银行测算，一个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通过采用全范围的智慧管理，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城市发展的收益将增加2.5至3倍。目前，智慧城市已成为大数据发展的主要载体，成为“互联网+城市”的主要形态。随着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推进，我国智慧城市将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机遇，并辐射整个产业链，形成巨大产业规模。另外，围绕国家“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和城市群总体规划布局，加强智慧城市群、智慧城市带的统筹规划和衔接配合，有利于提升我国智慧城市产业核心竞争力和“走出去”的能力。

建设智慧城市有利于创新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当前，我国城市治理正从粗放型、经验型、公众参与少的城市治理机制向信息化、智能化、多元共治的城市治理机制转型。建设智慧城市，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加大数据开放和信息共享力度，有利于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改变传统社会治理中的“差不多”现象和“拍脑门”决策，推动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城市管理新方式。这将有效提升城市管理的普适性、可及性和针对性，实现精细化、精准化管理。同时，建设智慧城市将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的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围绕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在城市管理、创业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公共安全、交通出行、社区服务等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领域提供广覆盖、多层次、差异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化和均等化，不断满足城市居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受。

第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